

引言

新时期初期的“美学热”是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思想史事件，它造就了历经波澜之后中国美学的复苏。如果说朱光潜与宗白华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双峰”^①，那么无论从影响力还是从著述量来看，朱光潜与李泽厚都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双峰”。从1978年至1985年，以这两位美学家为首引导了“美学热”的新一轮高潮，促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复苏。他们或爬梳考证，或自创新见，为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思想重启了诸多重大问题，因而也直接开启了1985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文化热”。本书尝试以朱光潜和李泽厚在新时期初期的思想演进为主要对象，同时适当辐射同时代其他美学家（如宗白华、高尔泰等）相关的美学思想，希冀在一个反思与批判的识度之中，经由美学复苏的视角，去重审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起源与流变的成因、脉象、价值与意义。

一、在思想史视野中返回新时期美学

毫无疑问，新时期初期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有着特别值得关注的意义。正如李泽厚曾指出的：“美学热是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中国为什么有美学热，是值得研究、讨论的。”^②但本书面对这一对象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进入新时期美学的研究”，而解答这一“如何”的问题，又必然涉及更为根本的“为什么要进入新时期美学的研究”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后者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方法论的更新必须奠基于价值论的重新考量。为什么要研究新时期美学？其实这一问题又指向了更深层的内在学理思辨：新时期的学术思想解放为什么是以美学开始的呢？在那个年代，美学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历史功能与思想责任？这些问题都在逼视着研究者们能够提供出更为有力的解答。

其实，对于新时期美学的探讨，已经相当丰富，今天再来做一番研究无疑是一种重新阐释，那么，这种重新阐释是否有必要？它的意义何在呢？在这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提倡的“永远历史化”的准则

① 叶朗主编：《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② 李泽厚：《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 2001 年对谈录》，68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他所说：“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目前的经验”，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里，老式哲学美学的那些问题本身就需要从根本上历史化，而且可以预见，它们将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①。本书认为，立足于思想史视野，破除成见，激活历史，为未来中国美学的前行进行思想史的清理，这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重启对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研究是有着充分必要性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史视野，体现为对三个层面的关注。

其一，历史层面的重要性。新时期初期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有的几个关键转折时期。自1840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的重要时期，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1978年开启的新时期则如邓小平所说：“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②新时期初期，是中国社会重启现代化进程的开端。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重新寻找到一条既适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同时又不丧失民族国家自我主体性、文化传统特征的道路，就成为贯穿整个新时期思想理论任务的当务之急。重大的历史感促使人们对位居这一时期思想中心地位的美学热潮及其内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新时期初的中国美学是接承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和1949年以前的现代美学传统而启航的；另一方面，新时期初期中国美学的兴盛又直接关系到1978年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复苏，后来的“文化热”“国学热”，都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因此，新时期初的中国美学就有了继往开来历史意义。

其二，思想层面的复杂性。新时期初期的思想风貌有着波谲云诡的复杂面相。思想解放的历程并非“吹面不寒杨柳风”，而是“料峭春风吹酒醒”^③。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喧天锣鼓过后，“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④进展得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就学术思想而言，一方面，有着保守思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③ 20世纪70年代以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祝酒歌》：“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歌曲表现了20世纪70年代结束给民众带来的解脱感，“酒”作为一个典型象征，一方面是心情愉快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潜藏着将历史进行无意识压抑、淡忘的可能。

④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9-05-07。

想与改革思想的角力，这是在以往思想史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但另一方面，更有改革思想自身拿捏、考虑中的节制、审慎，而这却是以往思想史研究所少有论及的。如果说，保守与改革之间的论辩是“料峭春风”的话，那么改革思想内部慎重、复杂的思考则是一种显得有点孤独的清醒，区别于陶醉在改革时代的酒香之中的大众，这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反思。新时期初期中国美学所呈现出的诸多争论、辩驳，乃至具体到某一思想家自身话语所呈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也都只有置身于这一整体思想状况的复杂悖境之中才能获得有效阐释。

其三，意义层面的现实性。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思想的复杂之后，如果仅仅停留于历史的思想之中，研究所完成的或许只能是一种封闭式的知识考据。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或者可以说，关于新时期的美学发展“史实”，已经被人们耕耘、整理过许多了，再来整理本书，有什么必要呢？关键问题就在于此。纵览新时期美学的研究，人们多半仍停留在考据事实、整理旧说的层面，尽管“史”已经出现不少，但是“史”并没有进入与当下中国美学乃至思想状况的对话之中，没有成为激活人们对当下文化状况来龙去脉重新理解的活力所在。简短而言，亦即“史”仅仅是历史考据，与当下的现实思考丧失了联系。因此，我们重新进入新时期美学的梳理与研究，就应怀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期待，即在梳理新时期美学理论的同时，揭示出它对现实焦虑的关怀回应。并且，这里所说的现实焦虑还不应局限于1978年至1985年间的社会现实，而要涵盖自20世纪以来直至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有关社会中根本性困境的思考与解决，如对差异性与共通性、分裂感与团结感、现代化与传统性等具有张力的因素之间的辩证审思。只有当我们从历史感中提炼出美学的现实意义来的时候，历史才成为我们的历史，历史才能与现实融通起来，对过去那段美学史的回顾也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型塑自身文化认同、应对思想现状的根基。

在历史、思想、意义三个层次的思想史视野的递进中，新时期中国美学呈现出一种少有的纵深感：它既处于历史的一端，又牵扯着现实的脉搏。新时期的中国美学并不是思想的化石，而是已经融入了人们当下的思维、话语与行动，它呼唤着人们重新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进入它的美学历题中去，因为它的焦虑也就是我们的焦虑。

在回答了“为什么研究”之后，本书需要解答“如何研究”的提问。价值论的确认还需要方法论的证明，在提出本书的方法论之前，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前辈学者做出过哪些工作，塑造过怎样的当代中国美学的形象。然后，本书才能展开自己的探询，做出自己的回应，与之开展有效的对话。

二、新时期中国美学学术史研究综述

本书关注新时期初期即1978年至1985年间的中国美学复苏，这里集中梳理新时期以来美学学术史的研究概况。有关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学术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大陆地区研究和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中国的研究两大块。

1. 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概况

其实，早在新时期初期“美学热”进行时，就有学者开始着手中国当代美学乃至新时期美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了。1979年第5期的《复旦学报》刊载了蒋孔阳撰写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①，文章高屋建瓴，简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现代美学发展历程，然后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来美学大讨论的详细情况。文章以“美的本质”问题讨论为核心，将1956年以来的美学大讨论划分为四个主要学术派别：第一派主张美是主观的，以吕荧和高尔泰^②为代表；第二派主张美是客观的，以蔡仪为代表；第三派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朱光潜为代表；第四派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美学概况作了较为细致与全面的评析。在新时期美学复苏伊始，做这样一个工作有着鲜明的学术史意义，同时也为美学学科自主意识的恢复乃至美学家自我认同的重构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理据^③。继之，1982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向导》一书，收录了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几位美学家的自述，他们分别以不长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在美学道路上一路走来的经历。同书还收录了浮石的《现代中国的美学研究》与张中秋的《我国当代美学讨论综述》两篇文章，它们分别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学研究概况。值得注意的是，张中秋的文章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学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年到1965年，第

^① 蒋孔阳：《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载《复旦学报》，1979（5）。此文后被转载于李泽厚主编：《美学》，第2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② 文中所用名字为“高尔太”，高尔泰有时发表文章自己也用“高尔太”，但著书都使用“高尔泰”，本书统一使用“高尔泰”。

^③ 蒋孔阳此文刊发后曾寄予朱光潜，朱光潜回信：“急拆读《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大文，感到欣喜，一则喜故人无恙，二则喜故人仍坚持美学研究，态度认真，对当时论争中各派所持的要点作了简赅明了的概述，持论之极公允。这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一篇好文章，我年老健忘，对当时争论的情况已很模糊，有两个出版机构约我出一本过去的美学论文集，正愁不易下手，原来保存的有关资料已久被没收，大文为我提供了搜寻资料的线索，也替编辑者提供了很好的准绳，所以无任铭感。”朱光潜：《朱光潜教授给蒋孔阳副教授的信》，载《复旦学报》，1980（1）。可见文章的发表既激活了美学家的历史记忆，也为学术史的资料梳理与保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阶段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①。如果说，蒋孔阳论文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学术史上学术观点区分的话，那么张中秋的文章则首先自觉意识到了当代美学研究本身的历史时段问题。

除开综述性的文章，就是美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了引导“美学热”的顺利展开，《美学向导》特意编撰了四个要目，分别为：《我国现代美学论文要目》（浮石辑）、《我国当代美学论文要目》（陈文良辑）、《美学译文要目（1949—1981.6）》（郭兰芳辑）、《美学专著、译著要目（1919—1981）》（陈文良辑）。这几个要目为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同时也建构起了一种学科史的意识。美学资料的汇编工作由此延绵不断地展开。其中代表性的有，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从1984年到1988年出齐了四卷本的《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辑录了1953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要美学论文。

随着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的进行，初步的学术史研究也渐次开启。这一最初阶段的美学学术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对美学家进行思想述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翻新自有后来人——谈李泽厚》（忍言，《读书》1981年第1期）、《“历史之谜”的探求与“结构方程”的预言——李泽厚同志美学思想述评》（丛英奇，《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李丕显）、《历史“积淀”是美学的重要课题——试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梅宝树）^②、《从〈谈美〉到〈谈美书简〉——试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变与不变》（郭因，《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朱光潜先生美论中的实践观略评》（胡义成，《求索》1984年第2期）、《朱光潜晚近美学思想评述》（邹士方、王德胜，《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宗白华传略》（邹士方，《晋阳学刊》1984年第6期）、《王朝闻艺术论初探》（陈宏在，《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王朝闻美学思想初探》（里郎，《艺术研究》1985年第4期）、《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系统透视》（刘再复、林兴宅，《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再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梅宝树，《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蔡仪美学思想的新发展》（涂途，《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论蔡仪的美学思想》（郗吉堂，《河北学刊》1986年第3期）、《略论蔡仪的艺术思想》（王宏建，《美术研究》1986年第2期）等。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③，这是对已然逝去的一个美学时代做出的第一次全面总结，同时也标志着由老一辈

^① 张中秋：《我国当代美学讨论综述》，见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美学向导》，1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② 两文均见李泽厚主编：《美学》，第4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③ 这套丛书共包括七本：《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阎国忠）、《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林同华）、《王朝闻美学思想研究》（张本楠）、《蔡仪美学思想研究》（李兴武）、《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王生平）、《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高楠）、《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丁枫）。

美学家所开启的新时期“美学热”已经完结，即将过渡到美学历程的发展与衍变阶段。1988年，由李泽厚的博士生赵士林撰写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更是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美学发展作了全面的介绍，它以当代中国美学家的学术传略为经，以美学的基本问题和范畴为纬，考察、分析和阐释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客观、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学术脉络^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学术史研究还主要停留在资料搜集整理与对美学家个人思想的初步评述上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当代美学学术史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自觉和益发深入了。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美学学术史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思想传记型。这类著作多以某一美学家的生平为主线，勾陈往事，发掘材料，将美学家的思想与其人生历程互相阐发，述评结合，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美学家思想生活的成长过程。代表作如蒯大申的《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②、钱念孙的《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③、王德胜的《宗白华评传》^④等。

第二，事件梳理型。主要代表有阎国忠的研究，他以“走出古典”为主题，集中于梳理新时期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次美学论争，主要包括“共同美”的讨论、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手稿》讨论、艺术本质的讨论、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以及实践美学的讨论^⑤。此外，戴阿宝、李世涛则将视角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审美功利主义与审美自由主义的对峙为主线进行学术梳理，主要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的共同美、自然美及《手稿》论争、90年代以来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审美文化研究论争^⑥。

第三，问题观念型。这一类研究以美学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或者概念为线索，通过对关键问题或关键词的梳理去窥测美学史的变迁。如阎国忠主持的观念型研究，分别以王国维的“境界”，宗白华、吕澂、朱光潜、叶朗等人的“美感经验”，蔡仪的“典型”，高尔泰的“自由”，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的“实践”，周来祥的“和谐”，后实践美学的“生命”（“生存”）为主题，概述了一幅中国现代美学关键词的历史画卷，而下编则聚焦于美学学科定位、美学的对象、人与自然的统一、美学方法论这四

① 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② 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③ 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④ 王德胜：《宗白华评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 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⑥ 戴阿宝、李世涛：《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辨的探讨^①。此外，陈望衡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试图从中国现代美学本体论问题产生与发展的视角来权衡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它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西方美学的传入和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问题的提出”，时间为 1911 年至 1949 年，下编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多元探索”，时间为 1949 年至 1999 年。在下编中，除开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的本质论战外，作者着重聚焦于新时期以后的美学发展，概述了 80 年代关于《手稿》的论战，以及以“实践本体论”为主要代表的多种美学本体论的状况，并提出自己思考所得的“境界本体论”^②。

第四，影响比较型。这类著作侧重于研究中国古典美学、西方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如彭锋的研究，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区分为框架，界定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在中西比较视野中获得的理论定位：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美学在总体上属于现代美学，而蔡仪、李泽厚以及实践美学则属于前现代美学，至于后现代美学只有在诸如鲁迅等少数思想家身上略有表现^③。牛宏宝等则在详细调查与统计西方美学译介进入中国的情况方面做出了贡献，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 1949 年以前中国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所谓“三重结构性倾向”：“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中西启蒙的“视域融合”、以“艺术心性论”解释西方美学。另外还探讨了康德、克罗齐、尼采和黑格尔在中国的命运，以及不同时代的中国美学家们的代表作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包括朱光潜的《谈美》、王朝闻的《美学概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李泽厚的《美学四讲》^④。而袁济喜的研究则是为数不多的从传统文化角度来探讨 20 世纪中国美学传统因素的尝试。他以朱光潜、宗白华、林语堂为个案，分别定位于“在诠释中转化传统”“在体验中激活传统”“在交汇中寻觅传统”^⑤。

第五，思想脉络型。这类著作着重于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去探究美学在现代中国发生、发展与社会思想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如尤西林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纷繁的美学热效应现象背后有着支配诸种表象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不仅关系到启蒙运动产生的美学学科的现代性意义，还关系到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强化的人文主义倾向与社会主义国家

^① 阎国忠、徐辉、张玉安、张敏：《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② 陈望衡：《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彭锋：《引进与变异：西方美学在中国》，13~14 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④ 牛宏宝、张法、吴琼、吴伟：《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⑤ 袁济喜：《承续与超越：20 世纪中国美学传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演变^①。如祝东力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繁荣，而是“文化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段内心历程的表征。在那个时代，美学学科实际上承载了超越于自身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含义。因此，他重点探讨了新时期“美学热”到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批评这一段的美学发展史，揭示了导致“美学热”兴盛及衰落的社会意识形态含义，并兼及当代知识分子境况变迁的研究^②。邹华则以“和谐与崇高的转换”为思想线索，贯穿中国现代美学史，力图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上来把握中国美学的演进^③。夏中义的研究，将视角跨越美学与文艺理论双重领域，聚焦于新时期数位在美学文论领域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刘再复、鲁枢元、李泽厚、刘小枫等），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论美学思想场域做出了独到而细致的分析，其中尤为精彩的是对李泽厚与刘小枫等人之间或显或隐的思想交锋所做的论述评价^④。薛富兴的研究，以蔡仪美学、朱光潜美学、李泽厚美学、周来祥美学为个案分析基础，勾画出了一个1949年到21世纪初的中国美学发展图景，即美学“三部曲”：初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复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内在的审美意识理论是“‘新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从确立到衰落，再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⑤。此外，还有朱存明的《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⑥、邢建昌与姜文振的《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⑦、聂振斌等的《思辨的梦想：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⑧、封孝伦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⑨等，分别从启蒙精神、文艺美学、现代性、审美意识等不同视角来贯穿透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除专著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借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之机，回顾与反思新时期美学乃至20世纪中国美学的论文层出不穷。1998年在中国美学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要对20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做全面回顾与梳理，会后编撰了一本论文集

^① 尤西林：《“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页》，见《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178~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8。

^③ 邹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④ 夏中义：《新潮学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⑤ 薛富兴：《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⑥ 朱存明：《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⑦ 邢建昌、姜文振：《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⑧ 聂振斌、章建刚、王柯平、徐碧辉、杨平：《思辨的梦想：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⑨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①，该书汇集美学界数十位专家，分别从“问题的提出”“历史与反思”“承续与转换”“历史中的个人”四大方面来探讨，从百年中国美学的提问方式、美学思想与中国思想等理论后设反思到20世纪中国美学，从西方资源、传统资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的关系反思到各位美学家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关系，数十篇论文概览了20世纪中国美学史诸多重要问题。2007年以来，美学学科的研究者们纷纷再次聚焦于新时期美学的发展历程，试图从中总结经验问题并开拓未来道路^②。

2. 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中国研究的概况

中国港台学界关注大陆当代美学思想，最早源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美国檀香山召开国际朱子学会议，会上台湾学者傅伟勋结识了李泽厚。随着两岸学术关系的发展，1986年4月傅伟勋教授应邀访问大陆讲学三周，回台后写作了一系列的文章向台湾知识界介绍大陆学术界的现状，其中两篇文章专门评述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一篇着重介绍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傅伟勋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但有批判地继承，且有创造的发展倾向的是美学这一部门。”他分析这种美学突破的原因有四点：(1)美学理论本身有助长革命情绪与精神团结的积极功能；(2)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与学术资料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基础；(3)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审美性背景的假定；(4)70年代后期的爱国主义情绪有助于传统美学的再发现。傅文高度评价了《中国美学史》的学术水准，并对比台湾美学研究，倡导“打开我们美学研究的途径，与大陆学者争长竞短”。同时，他也指出了该书的局限，如没有彻底冲破教条主义限制、标榜过度的华夏优越感等。另一篇文章则对李泽厚的生平、性格及学术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就《美的历程》及其他思想史著作，乃至“主体性实践哲学”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③。

^① 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② 2007年以来讨论新时期美学史发展的重要论文集有：王德胜主编：《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王德胜主编：《问题与转型：多维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美学》，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重要论文有：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曾繁仁：《回顾与反思——文艺美学30年》，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王一川：《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的三次转向》，载《当代文坛》，2008（3）；陈雪虎：《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30年回望》，载《当代文坛》，2008（3）；王德胜：《“去”之三昧：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4）；高小康：《美学学科三十年：走向离散》，载《文艺争鸣》，2008（9）；刘士林：《中国美学30年的内在理路与未来愿景》，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11）；代迅：《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新时期中西美学关系及研究方法的反思》，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12），等等。

^③ 傅伟勋：《审美意识的再生——评介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李泽厚的荆棘之路——大陆学术界的“苦闷的象征”》，两篇文章均见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哲学与宗教”三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台湾学者熊自健则关注中国当代思潮的研究，他以“儒学自由主义”的立场，评论当代中国大陆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美学及文学理论发展是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撰文探讨“朱光潜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朱光潜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与朱光潜早年坚持的完整人格理想相一致，同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观点也解决了朱光潜早期唯心主义美学所带来的理论困境，使得朱光潜得以重新认识与评价西方美学。同时，朱光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与境界，带来了新鲜的人道主义气息，朱光潜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方法为依凭，写出了《西方美学史》，创造了新的学术高峰^①。另外他还以“朱光潜与康德美学的对话”为视角，探究了朱光潜思想由前期演进到后期发展的历程，颇为精当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朱光潜学术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②。

此外，台湾学者龚鹏程在其对台湾美学的研究中，也曾关注到大陆“美学热”的发展，认为：“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学热，……除了翻译西方论著之功不容抹杀以外，可以称道的，主要是走出了一个‘人学美学’的方向。”^③除此，他还详细探讨了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与蕴含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美学发展的困难在于“与传统断隔了的危机”以及“对西方美学理解的疏陋”，要么因关切政治而忽略了美学和美感教育，要么太强调美学改造社会功能而使其工具化。他通过梳理从蔡元培、王国维到朱光潜、宗白华的“两种美学路向”，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提出了中国美学面临的诸多问题^④。

除了港台学者之外，海外研究的学者们也有部分涉足当代中国美学领域的研究。如刘康的研究，他以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关系为视角，在探讨中国近代直至当代美学发展的过程中，反思了广泛的政治与文化问题，结合中国近现代的改良思想、革命思想、改革思想，将中国美学置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的双重时空坐标中，探讨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modernity)、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

^① 熊自健：《朱光潜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当代中国思潮述评》，51～9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② 熊自健：《朱光潜与康德美学的对话——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演进》，见《当代中国思潮述评》，99～12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作者同书另收有《李泽厚对儒家思想史的析论》《刘再复的文学理论及其冲击》等文，是对新时期大陆思想史、文学理论领域相关学者的述评。

^③ 龚鹏程：《台湾美学与人文》，载《思与言》，2002，40(2)。龚鹏程这里所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学”显然属于误解，可能源于对大陆历史文化语境的生疏所造成的，但是他所概括的“人学美学”还是比较准确的。

^④ 龚鹏程：《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蕴含之问题》，见《近代思潮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

ternity) 的种种纠结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革命间的关系成为他关注的焦点^①。王斑则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崇高”为理论焦点，穿梭于 20 世纪中国的美学理论、文学创作乃至电影文本，在一个泛文化研究式的路径中，探讨了中国美学与中国政治的关系^②。

总的来说，因为时空距离而带来的视角差异，中国港台及海外研究给予我们的美学史研究以诸多不同而富于启发性的思路。

三、本书研究对象、思路及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初期的中国美学。所谓“新时期初期”，本书将之限定在 1978 年至 1985 年间^③。做出这样一种限制性划分，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符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变迁；二是照应文学、艺术、学术领域的现象演变趋势；三是考虑到美学研究主体即美学专业从业人员的代际更替。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变迁是界定新时期初美学复苏不可或缺的时代背景。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现代中国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方面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围绕“两个凡是”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78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认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④会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下放到各省、市和自治区讨论与执行。这意味着国家将农村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会议同时还号召“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也就吹响了思想解放

^① 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③ 与本书时段划分一致的有高建平的研究，他曾将新时期三十年的美学发展划分为：1978—1985 年的“美学热”，1986—1989 年的学院化倾向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1990—1995 年的美学被冷落，1996—2000 年美学的复苏，2001 年以后的新世纪美学发展。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的新号角。因此，新时期的开端定位于 1978 年^①。

本书将“新时期初期”的结束定位于 1985 年，是考虑到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已经经过了数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渐为包产到户所取代，“公社”与“大队”的名称被旧有的“乡”和“村”所取代，“农业在经历了 1/4 世纪的集体化尝试以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②。到 1985 年，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催动下，社会经济体制与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经济改革开始向城市转移。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认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号召恢复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 的构想，这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即将开始进入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新阶段。这种政治经济整体上的改革转变造成了 1985 年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更加积极、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新阶段。

其次，文学、艺术、学术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也与新时期初的美学复苏相伴相生。文学创作上，1978 年 8 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本科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从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文学潮流——“伤痕文学”。自此到 1984 年间，相继产生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创作潮流。很明显，阵阵文学潮流的兴起，与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84 年 12 月，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汇集杭州召开会议，不约而同集中讨论了“文化”的话题，这就为 1985 年的“寻根文学”打开了理论思路^④。从追抚“伤痕”发展到自觉追寻文化之“根”，文艺创作在保持与政治张力状态关系的同时，逐步寻回了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文化根性。

就高层政策而言，1979 年 10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祝词》，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

^①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是：作为新时期美学研究“破冰”之举的“共同美”讨论，其展开过程颇为曲折。作为讨论引子的何其芳遗作《毛泽东之歌》发表于 1977 年第 9 期的《人民文学》上，可是直到 1979 年朱光潜才在同年第 3 期《文艺研究》上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这才促成全国性美学讨论真正开启。而这已是三中全会结束几个月后的事情了。以此推断，在 1976 年至 1978 年这一段时间，美学家、理论家们还在观望局势的变化走向。

^② [美]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谢亮生等译，530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6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 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6）。

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这还是着重于恢复文艺创作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所损耗的元气，鼓励饱经劫难的作家们拿起笔来重新投入创作。然而，到了 1984 年 12 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祝词，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并进一步强调，“这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下召开的，是在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②。显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 1984 年的深入展开，文化领域也随之更加开放，作家们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

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学术层面，不难发现，1978 年到 1985 年这一段时间，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兴起了一股“美学热”的强流，是它率先冲破了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宰制牢笼。但是，这股思潮又呈现为内部包孕多端的种种复杂话语形态：以康德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主体性话语，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为代表的实践话语与人道主义话语，以维柯、孔子等中西古典传统资源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哲学话语。新时期初期的中国美学思想，通过采取一种“通情达理”（通过情感的抚慰达致理智的认识与谅解）的学术策略，来治疗由意识形态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此时的美学经过经典哲学美学理论回归的学术策略，试图找到一条返璞归真、除旧布新的学术发展道路。无论是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还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无论是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还是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呈现出一种审慎而有节制的前进姿态。

1985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该社组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第一本《人论》（甘阳译），这意味着新时期思想主潮开始从“美学热”过渡到一个新的“文化热”时代。虽然，就书名而言，表面上似与前些年的人道主义讨论有着相通的地方，但是书的内容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变化。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说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20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文艺研究》，1985（2）。

的实践主体，而是一个“创造符号的动物”^①。随后，一批西方现当代哲学著作得以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丛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由汤一介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伴随丛书出版而兴起的，是学术团体的涌现，几乎每一套丛书后面都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学术团体。这些现象背后的时代趋势是，学术研究超越了1985年以前的对极“左”意识形态的批评，将思辨精神推向了历史文化意识的根茎深处，甚至文学创作同样也走到文化寻根的阶段。“文化热”取代了“美学热”，正如一位过来人回忆：

1984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已推行到第五年，社会经济体制与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经济改革顺利完成，经济改革开始向城市转移；……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讲习班，组织著名学者及海外学人宣讲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一时比较文化或文化比较成了全国瞩目的课题，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文化讲习热。1986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推出了系统、全面引介西方近代人文学科重要著述的计划，又引发了全国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短短两三年中，以文化引进和文化反思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在整个神州大陆兴盛一时，“文化”一辞，以它对人，对人生、历史、社会的巨大涵盖力，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无孔不入的幽灵，取得了超前的影响力。^②

最后，是美学专业从业人员在1985年前后一段时间里开始出现了代际更替。早在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就向教育部门提出了“要后继有人”的问题^③。197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④。这种人才断层引

① 据甘阳说，就是因为这个书名，所以成为当年最大的畅销书，一年内印了24万本，但是这完全是阴差阳错，因为该书主要观点与人道主义完全不相干。在甘阳看来，80年代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美学热”，另一个则是他所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进行的进入西学前沿的工作，而非简单化批判极“左”思潮。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198~2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但是我们认为，甘阳的这一判断或许有两处可以作更细致的讨论：其一，所谓的“两个80年代”并非同时开展，而是呈现为接续性的顺序，因此“两个80年代”实际上还是一个80年代；其二，就算是“美学热”，也并非简单化的批判极“左”运动，其内部的复杂层面或许恰恰构成了“文化热”兴起的无意识资源。

② 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7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邓小平：《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发了政治家的历史紧迫感，最高决策层当机立断从 1977 年开始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许多青年得到鼓励，报考了大学^①。1978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当年，朱光潜、蔡仪和李泽厚同时招研究生，均招 5 人，分别有 300 多人报名^②。按照规范化学制计算，文科类大学本科生培养需要四年，研究生需要两年到三年。如果一名学生顺利将本科与研究生连续攻读，到 1985 年左右，也已经毕业，并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更特殊之处在于，那是一个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代，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一切都是从头再来，甚至诸多学子尚未走出校门，即已进入社会文化之中，推动了新的文化热潮接连兴起^③。正如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创作视角出发，看到了“77 后”群体的群际效应：

如果说，朦胧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主力军属于从 50、60、70 年代跋涉过来的作家队伍（简称“49 后”群体），其中当然也不乏来自“文革”的“知青作家”群体和“77 后”群体的零星参与，那么可以说，正是由于“77 后”群体的大量加入和强势生产，后朦胧诗、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潮流才能变成现实，具体地说是从潜流变成主流，从汨汨溪流变成浩浩大江。^④

其实，“77 后”群体已经与“49 前”“49 后”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一种代际差距。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同时还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这个代际更替的时间点就在 1985 年左右。1980 年，朱光潜曾对这种代际之间的历史责任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和任何事业都落在中年这一代人身上，就是四十到六十岁这一代人。”^⑤ 其实，这还是指当时文学作品所关注的“人到中年”的这一社会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压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渴求，几年间，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涌现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美学家高泰在 1983 年就敏感地把握到“‘美学热’正在静悄悄地降落下去”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并非只是诸多跨学科方法论的“一波才动万波随”。作为“49 后”的一代知识分子，高泰心情复杂，“一面感到欢欣鼓舞，一面也隐隐有些不安：害怕自己

^① 陈建功等：《我的 1977》，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② 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

^③ 如甘阳所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及其翻译团体，很多人都是当年尚在读的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如甘阳当时所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大当时的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半，所以《人论》出版的时候，他尚未毕业。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189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④ 王一川：《中国现代 I 文学与现代 II 文学的断连带》，载《文艺研究》，2008（4）。

^⑤ 朱光潜：《怎样学美学——1980 年 10 月 11 日在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的讲话》，见《朱光潜全集》，第 10 卷，511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落在时代的后面”^①。其实，这里不仅有新的学科方法兴起所造成的紧迫感，更是暗含了新一代知识群体兴起对老一代美学家所造成的代谢感。

1978年到1985年间，是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王朝闻等“49前”知识分子与李泽厚、高爾泰、蒋孔阳等“49后”知识分子重新进入时代的高潮期。他们或进发创作，或整理旧我，显示出了承接“五四”以来现代美学传统与1956年美学大讨论以来当代美学传统的努力。1985年以后，随着头两届研究生的毕业，诸多“77后”学子告别师长，独立进入哲学、美学、文艺理论领域，从而掀起了一股股新的学术热潮。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先生与世长辞，1986年12月20日宗白华先生溘然长逝，两位美学老人的逝去最终标志着一个“美学热”时代的落幕。美国学者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

现代社会比昔日的多数社会更热切地注重“世代”这一概念，因为现代社会较为重视“年青人”。“年青”已经成为要求特权和摆脱过去范型的理由。“一代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已成为一种与社会中老一代的某种信仰和惯例进行斗争的战斗队伍；这些老一代人保持了大量的旧事物。^②

确如其言，在这个关节点上，哲学美学与文艺理论界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迅速兴起，相较老一代美学家，显示出了更为异彩纷呈的知识面貌。但是，两代人却并非完全对立，在理论关注与学术兴趣上，他们既有差异也有承续。一方面，老一辈的美学家们，无论是老年的朱光潜，还是中年的李泽厚，都还保留了基于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经验的治学模式与研究理念，难怪乎至今仍有研究者将之视为“古典模式”或“前现代模式”；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却又是从老一代人的爱护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尽管有着很大的学术取径差异，但是根本问题意识却暗自有着隐秘的勾连与相仿的底蕴。1985年，宗白华的弟子刘小枫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他自述经历时，提及20世纪80年代初《美的历程》的出版，改变了他对中国哲学的成见，使得他狂热地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美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③但是到毕业之前，他却已对美学专业感到冷淡，“直到1984年才接触到真正的哲学，就像那年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雪：舍勒令我尖锐、海德格尔使我沉迷、舍斯托夫让我感动、维特根斯坦给我明晰”^④，他旋即转入哲学、神学的研究。在刘小枫转入哲学、神学研究的同

① 高爾泰：《前言（一）》，见《美是自由的象征》，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②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刘小枫：《修订本前言》，见《拯救与逍遥》（修订本），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④ 刘小枫：《修订本前言》，见《拯救与逍遥》（修订本），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时，另一些坚守美学领域的年轻知识分子则迈出了认识论美学，而进入了体验论、存在论美学领域。1982年进入北大求学的王一川，在导师胡经之的引导下，开始关注体验问题，硕士论文选择了《论艺术的内在结构》，后来在攻读美学家黄药眠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期间，继续致力于疏通西方体验美学的思路，1987年完成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①。显然，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呈现为复杂的多层次面结构：一方面，他们已经在美学研究上完成了范式的转换，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美学、心理学美学，将新时期之初还站立于物质实践地面的主体性哲学引向了多重文化旨意的探索实验场；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学术发展方向又与新时期初期美学家们筚路蓝缕的探索耕耘密不可分，无论是走向神学、哲学，还是走向文化、体验，乃至反传统，无一不与新时期初期美学复苏中所包含的诸般思想线索构成了并不遥远的呼应^②。

至此，从政治经济整体变迁、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新潮涌现、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出场三个方面来看，大约以1985年为界线，新时期美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49前”与“49后”两代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或在1949年之前已成名，或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冶炼，形成了自己对学术的基本看法；新时期初1978年到1985年间，他们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由于往日声誉的恢复，这些美学家们重获知识权威地位，引发了人们对美学的关注与热爱。他们在突破僵化意识形态樊篱的同时，也展开了一些新的学术理路脉络。1985年以后，随着“77后”学术群体的兴起，前一拨重要的美学家或相继谢世（如朱光潜、宗白华），或转移阵地（如李泽厚），因而美学研究实现了复苏后的另一种转变，不过这已超出本书所要论述的范围。

本书关注于1978年到1985年间，由前两辈的美学家们所开启的中国

^① 王一川：《后记》，《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373～37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②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认为“文化热”接续了“美学热”的观点，还可以从一套丛书的命名看出来，即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从1986年到1989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丛书”，丛书内收专著16本：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1986）；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6）；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1986）；刘晓纯：《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1986）；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1986）；谢选骏：《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1987）；肖君和：《现代人的艺术系统》（1987）；王振民：《摄影审美心理学》（1987）；吕澎：《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1987）；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1988）；谢选骏：《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1988）；洪汉鼎：《费希特：行动的呐喊》（1988）；谢遐龄：《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1989）；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1989）；翟华：《观念世界探幽》（1989）；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1989）。可以看出，这套丛书中主要由7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担纲，且有不少属于艺术学、美学方面的研究，但是此时都已经被置于“文化哲学”的名义下。因此，“文化热”其实是“美学热”的接续，此说并不为过。